

思想史

余英時題

Intellectual History

專號：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

王曉琴

范廣欣

蕭高彥

林正珍

戴麗娟

楊正顯

3

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專號：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

3

2014年9月

思想史

思想史 3 專號：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

2014年9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編 著 思想史編委會
發行人 林 載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225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 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 話 (02) 29178022

叢書編輯 陳 逸 達
封面設計 沈 佳 德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469-6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思想史第3期編輯委員

呂妙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Miaw-fen Lu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沙培德	康乃狄克大學歷史學系
Peter Zarrow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陳正國(主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Jeng-guo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Ko-wu Hua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蕭高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Carl K. Y. Sha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編輯顧問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	David Armitage	Harvard University
余英時	普林斯頓大學	Peter K. Bol	Harvard University
村田雄二郎	東京大學	Benjamin El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林毓生	威斯康辛大學	Knud Haakonssen	University of Sussex
張灝	香港科技大學	Jonathan Israe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inceton
陳弱水	國立臺灣大學	Nicholas Phillips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		
葛兆光	復旦大學		
羅志田	四川大學/北京大學		

助理編輯

羅皓星

(依姓名筆劃排序)

發刊辭

整體史學之興衰與思想史之興衰相維；反之亦然。

史學興盛的原因眾多；有緣於外部因素者，如某類重要或大宗史料的突然出現、政治因素的推波助瀾、學科建制化之後的自我複製與再生產的能力等等；但真正能讓史學持續灌入活頭源水的原因，則在於吾人主觀上對重要歷史課題的強烈好奇；以及足以將好奇轉化成學術議題的社群對話。史料、政治或知識環境固然可於一時之間創造史學研究的能量，但研究者能否從史料爬梳、凝塑出具深遠意義的課題，從而回饋給政治環境以多元反思的歷史理解，則與史學社群對歷史學的持續回顧與提高視野密切相關。如果歷史學界不願將這類自我理解與反思的功課交付給專事方法論的哲學家，那唯一的可能，或許就是有待思想史從業人員更積極地介入此道，讓整體史學能夠從中汲取足夠的養分。

上述所言不等於冀望思想史家自命為史學界的導師。正好相反，許多思想史家在創造議題之時，只是史學軍團的游擊兵或初入史學花苑的小園丁。思想史家無法告知我們真實如何取得，或史學應當如何等等認識論的規範真理，而毋寧是提出議題及其重要性的討論。胡適當年「截斷眾流」，將春秋時期之前的思想論述從中國哲學史中剔除，無疑正面地激撓了當時的史學重要議題。馬克思提議的資本主義

批判史觀，不只導引了近代討論資本主義興起的史學重鎮——例如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等人，也造成現代史學對下層社會歷史的關注。他們都未曾自命為思想史家。但無疑的，若要周全地討論近代思想史，他們的著作或想法絕對不容忽視。他們都關心於如何將歷史概念化、意義化、問題化；從而能夠介入重要的歷史議題。

從概念到重要歷史議題中間的論證發展當然有許多種路徑，其關係也不是一路平遂，常常充滿糾葛。但開放地接待概念與歷史議題之間的關係，或許是對思想史研究最佳的「定義」方式：思想史不是個既定的領域，它的疆界，或正確地說，它的生命注定隨著概念與歷史議題之間多樣的關係之開展而開展。如果討論一件宋代陶器時不預設所謂器型、風格或歷史脈絡是既與或既定的，那麼研究者勢必得從器類的思維範疇開始進行思考研究，進而了解此陶做為當時美感秩序、生活秩序、甚至禮儀或政治秩序中的因素或配件的地位與意義。再者，工藝之內容反映美感價值之分疏、判斷、選擇，正如同工匠的社會存在反映時代對職業、人格、地位、榮譽等等的價值態度。統整各類細微價值而描繪出某一歷史社會、族群的人生態度、價值取向，是思想史家正當且當為的知識目標。

將思想史的畛域推至如此之大，其實是漢語思想史之傳統使然。近幾十年來，隨著史學的專業化，漢語思想史家們對某一文本、思想史人物、甚至時代思想氣氛的研究與日俱進——其成果也確實令人燦然欣喜。但是過度的專業化永遠有自我區隔的風險。如何讓漢語世界的思想史重新與整體史學的命運密切聯繫在一起，應是此刻思想史研究者不可迴避的課題。本文首揭「整體史學之興衰與思想史之興衰相維」，此義甚難以分析方式證成，只能以「歷史經驗」或「選擇之親近性」的方式略以示意。衡諸近百年之世界史學，應以法語、德語、

英語、華語史學界為四大傳統；應無疑義。而法、德、英語史學均有其獨特而擅場的「思想史」傳統，迄今未衰。法語世界有「心態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史學寫作，強調社群於長時間的集體心態或世界觀。無論學界對於何謂「心態史」、何人可為代表有所歧見，此一特色史學與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的年鑑學派（Annales）強調長時間、社會、經濟、人口等面向的史學發展息息相關，殆無疑義。德國世界則有「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提法，認為理解歷史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於掌握概念之變化以及概念與其社會之間的關係。這個史學傳統既有19世紀黑格爾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的遺緒，也有現代德國哲學與社會學的特殊影響力。英語世界在一九四〇年代有注重西洋文明傳統的美國學者 Arthur Lovejoy 所提倡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一九六〇年代後有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所強調的觀念之脈絡史學（contextual history of ideas），認為歷史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再現觀念本身，而在分析觀念的使用者與其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此種說法顯然與柯林烏（R. G. Collingwood）以及奧斯汀（John Austin）的思想（史）研究傳統有關。此外，歐美與英國尚有受到馬克思主義所啟發的思想史研究，例如 Keith Thomas、E. P. Thompson、Gareth Stedman Jones、Christopher Hill 等人的著作。如果單以社會史來統稱這些著作，顯然忽略了他們對於觀念的重視與分析，也過度撕離了思想史與整體史學的關係。而義大利裔的 Carlo Ginzburg 膾炙人口的 *The Cheese and Worms* 其實是精采的庶民思想史作品。總而言之，這幾個大史學傳統各自有其相應的「思想史」傳統。這絕非偶然，而是兩者之間形成回饋的循環有以致之。

淵遠流長且勝義迭出的漢語史學及其思想史之間的關係，與上述傳統其實並無二致。唯一差別在於華語世界有「樸學」的傳統，較缺

少哲學或方法論的辯證與語言來對自身的知識操作進行定性的工作。其實，漢語世界的「思想史」是個光譜或幅員相當廣的史學次領域。它涵蓋對觀念、概念的關注與分析，也包含智識份子的研究。甚至，緣於秦漢以降漸次成熟的經籍志、四部、學案、乃至有清一朝的考證學傳統，使得在近代漢語學術中，思想史與學術思想史很難完全切割；甚至在加入政治史或制度史研究體例之後，有「制度思想史」這樣少見於其他重要史學傳統的概念。漢語世界此種學術底蘊，造成自一九二〇年代起，風起雲湧的思想史研究盛況。梁啟超、錢穆等人固然是自認且公認的前後相望的思想史大家，其他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史學之大者，如前者的〈殷周制度論〉，後者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許多論文其實也都牽涉到制度與思想或大傳統的價值體系。如果思想史家錢穆的制度史寫作，是以通貫的史學思想為中國歷代制度加以定位，透顯制度背後的價值體系，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著作則是以制度說明大傳統或社會心態的結構力與滲透力。甚至一般認知裡，不被視為思想史家的史學教授，其著作也多半觸及，甚至處理思想史課題，例如沈剛伯從社會地理，討論先秦法家的起源與流派，以社會史著稱的李宗侗不只研究史學史，也注疏《春秋公羊傳》。即使是標榜「唯物史觀」的一些史家，如翦伯贊、郭沫若，尤其是侯外廬等人的史學作品，都相當關注思想與思想史。換言之，這一群被稱之為早期社會史的研究者，其實都有很深的思想史涵養，這使得他們的史著能夠對其他同行產生較大的啓示。甚至常被誤認為反對思想史的傅斯年，他最好的學術作品之一即是《性命古訓辨證》，也泰半與思想史密切相關。幾乎可以這麼說，不標榜思想史，甚至偶而質疑思想的重要性，懷疑思想史的確定性，卻實質上從事思想史工作並卓有貢獻者，是現代漢語史學的特色。漢語思想史富有豐沛的傳

統與水脈，使得研究者得以左右逢源，或者在潛移默化中，關注（學術）思想史的課題，或甚至運用概念來詮釋歷史。單一的經典思想人物、概念、著作、課題固然值得研究，但積極擴展議題，並努力概念化各類研究課題，期能在概念層次上與其他議題相通、相融而回過頭來搏聚成更具意義與廣度的議題，或許是讓思想史重新成為漢語整體史學之底蘊的唯一可能。

相較於法、德、英語世界的現代思想史寫作，漢語世界的思想史傳統雖然較少方法論的自我釐清與自述，卻有更為寬廣的學術史、制度史底蘊。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左派的「批判史學」與右派的「同情的理解」之間的齟齬如今已然低盪，逐漸相融於同一個史學傳統。加上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遠大傳統，使得漢語思想史在課題廣度、態度、時間向度上，或許尚不足以稱之為遠邁於其他語言世界的思想史傳統，卻鼎足並立而有餘。可惜，雖然自20世紀晚期開始，漢語史學明顯有去意識形態化、去物質主義化的傾向，卻似乎同時也有去思想化的傾向。晚近去思想化的傾向，可能原因是在所謂全球化、普世化的當代政治生活中，一些基本的價值與概念，諸如民主、憲政、人權、正義、國家理論、主權等等常常被認為均源自西方，使得傳統中國或華文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當性需要予以特別說明，或常常只能在反抗西方中心論這種被動論述中建立正當性。另一方面，晚近西方史學中以新文化史為大纛的新物質主義史學，如消費、出版、醫療、視覺、身體、收藏等等史學主題，相當程度吸引了史學界的注意力。然而正如自稱為思想史家的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所展示，身體可以是思想史家的研究思考的自然場所。思想史與身體史或其他被籠統稱之為新文化史或新物質主義歷史的次領域，若始終平行發展，對彼此都是限制。如果思想史要獲取源

頭活水，它顯然可以發展概念化、問題化、意義化歷史議題的能力，將上述次領域的歷史意義——如果不是文獻——考量進去，並加以擴大。

漢語思想史學界的前輩已為此領域留下諸多典範與經典，但今日它所面臨的挑戰之鉅，也遠大於半世紀之前的景況。今日談論思想史而要求有通貫之識或橫跨三個斷代者，已如鳳毛麟角。跨國族或國際化的思想史寫作雖然有引人之處，但其困難度較諸槍砲或傳染病的全球歷史，不可以道里計。或許，在通古今之變與全球思想史之外，思想史可以更專注於議題的整合與擴大。思想史應該更敞懷地擁抱各類歷史議題，期能與整體史學的發展脈動同步。如果思想史家們相信，他們終究不只能回應、預流史學新潮，也能夠概念化、問題化、意義化各式新舊的歷史議題，思想史或許能夠成為其他史學次領域發掘議題、聯結議題、解決議題的靈感來源。此為本刊之所祝願，而願為路橋者。

編輯語

本期有三篇文章討論盧梭政治思想在中國與日本的早期詮釋與受繼。此三文各有所長，但都集中於討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尤其是其中最具魅力與爭議的概念：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王曉苓〈盧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國的引介及其歷史作用〉是一篇分析精細且具歷史縱深的精采論文。王文認為，十九世紀末日本人中江兆民精到的漢文譯本《民約通義》開啓了中文世界對盧梭政治思想的關注與討論。循此，王文約略依清末、民國、1949至文革、1990年代後等四個時期，分別列舉、闡述幾位具代表性人物。論文的前大半部依序討論梁啟超與汪精衛，嚴復、章士釗、張奚若，何兆武，王元化等人對「普遍意志」的理解與爭論；是精細的文本分析。王文認為，盧梭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普遍意志」概念具有「兩面性」(p. 56)。一方面，它彰顯人不可讓渡的自然主權—因此可能主張激進民主；另一方面，它又強調政治社會中的成員，也就是公民必須服從普遍意志的指揮—因此可能形成極權統治。這個兩面性導致了歷來中文世界對盧梭理解的分歧。王文最後從時代背景、政治議程以及政治環境的變遷等外部因素，論證上述各家對於盧梭思想理解的差異。從君主立憲到革命，從相信進步的人民民主到反左，在不同的政

治光譜下，反射出盧梭的不同樣貌。總之，王文是篇黑格爾式的思想史論文，以後世、歷史後設的立場，逐一審視主要闡述者的理解、翻譯、衍伸及其闡述的時代背景。在一種「全知」的眼光下，希望對過往的詮釋文本投以時代性的理解。

范廣欣的〈盧梭「革命觀」之東傳：中江兆民漢譯《民約論》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讀〉是問題意識清晰，論理強勢的學術文章。范文認為，盧梭政治思想並不強調革命，並不鼓吹消滅君主統治。那麼，范文問道：「近代以來中國人是怎樣通過閱讀《社會契約論》發現了革命呢？」（p. 70）這問題等於暗示、追問了中國近代革命意識的起源。根據范文的理解，此間與中江兆民翻譯《社會契約論》，也就是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的《民約譯解》密切相關。范文大量利用中江兆民自己在譯本中所加入的個人意見-〈解〉-，企圖說服讀者，中江兆民以相當迂迴、夾譯夾注、幾近微言大義的方式，逐漸將盧梭的「反對君主專制」，往「否定君主制本身」推進。（p. 82）范文進一步論證，中江刻意使用「黨」一字來表示‘society, aggregation, association, community, union’等多種不同概念，明顯帶有革命黨的修辭意味。（pp. 92, 95）相較於王文的歷史縱深，范文完全集中於中江兆民文本的內外部分分析，特別注意中江遣詞用字的意旨。但范文也注意到《民約譯解》在中國以《民約通義》重印面世時所發生的文本再造，尤其是重印版的序言，較諸中江激進，根本就是「徹底否認君主專制，而承認革命的正當性」。（p. 101）換言之，從日本的《民約譯解》到中國的《民約通義》，中國近代的革命思想依著這份亞洲的盧梭文本而生長。

蕭高彥〈《民約論》在中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考察〉是篇方法論意識極為清晰的論文。上述范文的論述注重作者認定的正確的、

非革命的盧梭，對照中江文本不狃於時而造作出的潛在的革命話語，以及此話語在晚清中國情境下的放大。如果范文可看成史特勞斯式的（Straussian）的文本解讀，蕭文則是自承、自省的史金納式（Skinnerian）思想史書寫：以翻譯文化理論來平衡史金納方法論中的主體意識與作為，而凸顯在地文化條件所釀醞的新種政治語言。蕭文的分析對象以中江兆民、楊廷棟、劉師培、馬君武為主，說明這些譯者及其文化在特定條件下所構思的翻譯策略與概念傳遞，創造出甚麼政治想像。以中江為例，他「君」「邦」「民」「士」「臣」等詞分別代表 sovereign, power, people, citizen, subject 等等，顯然是以儒家政論來安置新的、未來的政治秩序想像。但蕭文的目的不止於觀念的比較，而進一步指陳，這些特殊的翻譯可能指向何種政治議程。中江兆民以「君權」翻譯 sovereign，少了「主權者」這抽象的概念，導致了「以人民自為君主」遮蔽掉了「以人民自為主權」。其結果，傳統的個人君主統治制度在《民約論》裡變成不可能的選項。（p. 128）這其實反倒相當呼應中江在譯著裡強調的「民約」主軸。蕭文最精采的分析應該是有關楊廷棟的部分。從上述王文或范文的角度看，楊廷棟的翻譯顯得粗糙且錯漏百出。但蕭文以文化交會暨脈絡化方式來理解楊廷棟，反倒得出令人驚喜的文本詮釋。蕭文認為，關鍵在於楊廷棟以「公理」來翻譯「普遍意志」。這固然使得盧梭文本可以與傳統儒家清議概念疏通，但更重要的是，它「將盧梭的『民約』」「轉化成一種憲政主義論述」。（p. 136）這顯然也與楊廷棟強調輿論、議會或「集言之制」互為表裡。用更簡潔的說法就是，楊廷棟將盧梭洛克化了。（p. 137）而到了劉師培、馬君武等革命派，他們則強調危急時刻的「特別會議」，普遍的平等觀念，以及人民的權力等等指向在清末政治情境下的革命正當性話語。尤其是馬君武以「帝權」來指涉人

民主權，顯然「超越了中江的語彙系統」。(p. 156)

上述三篇文章分進合擊，將以「民約」、人民主權等概念為主的中國近現代政治語彙，甚至文化傳遞的研究做了具有多重對話效果的精緻展示。無論後繼研究者對這些論文評價為何，任何超越企圖，都必然具相當挑戰性。

林正珍的〈分裂的亞洲認同：近現代東亞世界觀的對位式呈現〉主題與前述三文相當不同，文類風格也完全迥異，但所論時代與社會則高度重疊，對研究近現代文化思想者，這四篇論文之間應該有相互印證啟發之用。林文提示道，相較於中國天下觀的限制，亞洲的亞洲概念是日本文化特殊論的產物。此概念一方面顯示出日本國族在既有的，亦即西方中心、資本主義的世界史框架中，追尋主體的努力，另一方面則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理性化或合理化接榫。這是相當精確也深具啟發的觀察。此外，林文仔細描述了日本思想界如何在近六十年從新亞細亞主義，也就是自任融合東西文明的角色，逐漸轉向多元與自省的亞洲觀。此一宏觀的歷史態度之考察，應該可以提供中日近現代比較史或交流史的研究者一個思考背景。

多元思考同樣是戴麗娟〈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一文的重要元素。戴文詳細介紹法國史家對於何謂歷史記憶所進行的發明、寫作與反省。根據戴文，歷史記憶就是相對於學院歷史書寫的歷史。它是民間的、多樣的、地方的、分散的，甚至是個人的。(p. 215) 換言之，我們現今所懷抱的性別、階級、國族等等認同，很可能有相當程度，來自非學院歷史的建構。這個認定或觀察，就是歷史記憶研究的起點與主要內容。這既是學院歷史的反省，也是學院對非學院書寫的介入。但是，誠如戴文所精確交代的，此一學院歷史的反省與介入——「記憶之所在」，也可能成為非學院、民

間、或媒體所欲收編的「所在」。本文是中文世界少見有關此一主題的詳盡介紹，相信它對中文世界西方現代史學史相關研究應該會有長久影響。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思想史 3 專號：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思想史
編委會編著，初版，臺北市，聯經，2014年9月（民
103年），276面，14.8×21公分（思想史：3）
ISBN 978-957-08-4469-6（第3冊：平裝）

1.思想史 2.文集

110.7

103018292

目錄

【發刊辭】	i
-------	---

【編輯語】	vii
-------	-----

【論著】

王曉苓 盧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國的引介及其歷史作用	1
范廣欣 盧梭「革命觀」之東傳：中江兆民漢譯《民約論》 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讀	67
蕭高彥 《民約論》在中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考察	105
林正珍 分裂的亞洲認同：近現代東亞世界觀的對位式呈現	159

【研究討論】

戴麗娟 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	191
-----------------------------	-----

【書評】

楊正顯 評方祖猷《黃宗羲長傳》	241
-----------------	-----